



彭国翔：化解全球化过程中宗教冲突的儒学资源

(2006-1-20 16:15:44)

作者：彭国翔

全球化似乎已是世人公认的一个潮流，但所谓“全球化”这一观念究竟包含怎样的具体内容，具有怎样的现实所指，恐怕是在使用这一用语来描述当今世界范围内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时需要有所自觉的。本文无法也不打算对“全球化”的具体内涵进行全面与细致的分析，而是要指出全球范围内的“西方化”趋势与不同文化传统自我认同的强化以及彼此之间的冲突构成“全球化”过程的一体两面，而宗教传统之间的冲突更是文化差异与文明冲突的核心所在。在此基础上，本文着重以阳明学者三教关系的思想和多元宗教参与的实践为据，并结合当今宗教学领域的相关论说，说明儒学对于化解当今世界宗教冲突所可能提供的有益资源。

全球化可以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加以定义；[1]也可以不局限于全球化的现代理解，而上溯其历史，甚至将古罗马帝国的军事扩张、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以及成吉思汗拓展疆域的征服都算作全球化的不同形式；还可以侧重从人类文明活动的某一个方面，如经济、政治、文化等来界定全球化。[2]但无论如何，有一点必须明确，即目前我们所谓的“全球化”，主要指的是二战以后随着科技、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全球性的一体化的趋势。这种全球化所涉及的范围之广，对全世界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之深，都是史无前例的。进一步来说，当我们使用全球化这一概念时，我们主要是想指出当今世界不同国家、地区、民族和各类共同体之间交往互动的日益密切以及不断趋同的现象。无论对全球化的具体理解可以怎样的“见仁见智”，但这一点恐怕是大多数人的一个基本的共识，也是全球化这一用语所指的核心内容所在。事实上，如果从语言分析的角度来考察当今东西方各种媒体对于“全球化”这一概念的使用，我们看到的几乎都是对这种趋同现象的描述。

就全球化所导致的“趋同”而言，我们要进一步深入反省的是这种趋同是趋向怎样一种“同”。事实上，全球化带来的趋同并非世界不同文化互动的“合力”现象，所趋向的“同一性”并非包含世界不同文化传统的要素而又根本不同于某一种文化形态的综合性的新生事物和新文化。而毋宁更多的是全世界范围内非西方的各种文化形态逐渐趋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尽管西方文化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但相对于全球范围内非西方的各种文化传统来说，我们确实可以以美国为例总结出一些西方世界共同分享的东西，譬如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个人主义等等，正是这些东西构成了我们所谓的西方文化。而如今的全球化也正是在向着这个方向趋同。此外，尽管如今非西方的各个国家、社会、民族也在力求发展出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文明模式，但我们必须看到，这种“求异”恰恰是在“趋同”于西方文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并且，只有在自身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变得非常西方化了之后才会产生。譬如，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家晚近对于民族文化传统认同的强调，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因此，认为全球化不过是西方价值的延伸和对非西方社会的侵略，虽然不无偏颇，却也委实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全球化其实是西方文化在“化全球”。[3]

[1] 社会学从人类互动意义增强的角度来定义全球化，即人类集团之间的联系，随着社会发展而逐渐加强，最后形成全球性的联系，这个过程叫全球化。政治经济学将全球化定义为英国资本中心出现之后，资本中心和资本外围的关系，这个过程不仅是经济过程，也是政治过程。

[2] 如曾获美国经济学杰出著作奖的威廉姆森和欧饶克的《全球化与历史》一书，就主要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谈全球化。

[3] 参见庞朴：“全球化与化全球”，《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0年10月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页76-77。

[\[关闭窗口\]](#)

版权所有：国际儒学联合会 Copyright©2003-2007